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二辑〕

# 赵树理文学与乡土 中国现代性

贺桂梅·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二辑〕

# 赵树理文学与乡土 中国现代性

贺桂梅·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 / 贺桂梅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7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2辑)

ISBN 978-7-5378-4845-9

I. ①赵… II. ①贺… III. ①赵树理(1906-1970)—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7704号

书 名 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  
著 者 贺桂梅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张永文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05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845-9  
定 价 36.00元



## 《赵树理研究文丛》编委会

主 任：杜学文 张志仁

成 员：赵魁元 杨占平 傅书华 和 悦

续小强 宋丽云 贾大一

主 编：赵魁元 杨占平

# 总序

赵魁元 杨占平

赵树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人民作家，是20世纪大众化文学的领军人物，在国内外具有非常广泛的知名度。他所实践与倡导的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为普通人写作的文学态度，曾经影响了几代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赵树理出生在太行山区，虽然没有置身于北京、上海等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但也分明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疾风骤雨同样对赵树理年轻的心灵产生了强烈冲击。这让从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影响的赵树理，能以一种民间姿态、“草根”意识来思考问题；而新文化关于自由、平等，关于科学、民主的追求，又使他比一般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了对既有一切的不满。于是，在赵树理身上形成了一种“我即是民”“民即是我”，“民”与“我”一体的思想观念。他企望改变中国现实的追求既是改变普通民众命运的努力，更是改变他自己个人命运的努力。

赵树理几十年深深融入农村社会现实生活中，与广大农民群众休戚与共，自觉地把自已当作农民中的一员。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群众能够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村政策有失误，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农民的甘苦即是他自己的甘苦，农民的冷暖即是他自身的冷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他不像某些知识

分子那样，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常常站出来指点江山、布坛论道，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他要用自己回归到民间，回归到农民之中的实际行动，表明一个作家的态度。

赵树理继承“五四”文学传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勇于在创作中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时，他从民间艺术和古典小说中汲取营养，创造了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现代小说样式和艺术语言。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是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我们说，赵树理的创作，完全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他身处中国图新求变，努力改革落后面貌的十分特殊的时代，在他人生道路和作品中，折射出普通中国人追求幸福理想、改变自身命运的奋斗历程和精神情怀。

今天，文学已经进入 21 世纪，但赵树理所奉行的做公众的代言人和文学的现实性、人民性、民族性精神，依然有着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依然值得广大作家、艺术家学习，更值得广大理论家研究。

因此，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在赵树理诞生 110 周年前夕，隆重推出《赵树理研究文丛》，这是近年来研究赵树理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应当尽到的职责。这套丛书的作者，有供职在各级文联或作家协会的评论家，有大专院校的教授，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赵树理做了深刻而广泛的研究。或许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尽相同，但都是对赵树理研究的开掘，都有可取之处。

我们认为，关于赵树理的研究与写作，同文学创作一样，也是因研究者的身份和习惯各有特点各具风格的；但是，从这套丛书中也能够体现出一些共性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有独创性。我们感受到，近年来的赵树理研究，随着研究者对作家资料掌握的丰富多元，也慢慢形成了各自比较明显的观点。作为一种讲求逻辑推理性的思维活动，不少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已经从过去只懂得同向性思维逐步向逆向性思维转化。同向性思维往往在研究赵树理的人生经历和作品时，只能跟在作家或作品之后做一些浅层次的阐释，比如，说

赵树理已经体现在作品中的主题、典型人物有什么特点、艺术表现方式是哪种等等，而这些却是作家和读者都大体上明白的事实。然而，逆向性思维则可以充分表达出研究者的独特之处来，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是通过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进行反经验的批判性思考，得出一些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与众不同却具有创见性的结论来。这种研究用独到的眼光，评判、分析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各种内在的和外部的蕴含成分，对公认的和传统的结论提出怀疑，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正是如此，才体现出研究者的独创性来。

其次是有真情实感。我们常常感到，当今的某些理论家做作家作品研究时，存在着一种浮躁现象，他们从事文学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拿到某种学位证书或专业职称，很少去发掘课题的深层次意义。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外在的社会因素，更有研究者本身内在的意图，而这种意图的核心，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真诚的感情。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赵树理研究界，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尤其是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满怀真情实感在研究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面对一辈子真诚做人、真诚处事的赵树理，面对赵树理决不违心写作的经典作品，研究者们都是用真诚的感情去研究。没有倾情付出的研究者，其文章也只能是精神涣散的体现，枯燥文字的堆积。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具备了真诚的感情，能够体验到赵树理的内心世界，体验到赵树理作品的本真之处，写出的文章不能说篇篇是精品，但都是有见地有思想的作品。

第三是立足现实。应当说，关于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研究的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研究者价值的尺度。我们强调现实性，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赵树理及其作品与当下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进行价值评定，关键是要能用当下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艺术标准去评判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并且能得出独到的看法或结论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可以说是具有了现实性了。之所以说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赵树理研究者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如果你的研究还停留在以往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新鲜的。一种不新鲜的结论，自然是难有多少价值让人们接受



的。由此可见，现实性是研究的灵魂。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秩序向规范化发展，文学逐步回归到了自己的应有位置，文学研究，包括赵树理研究也逐渐从尴尬境地走了出来。眼下，作家的创作显得相对轻松；研究者也随之放松了心态，在解决了自身知识积累和生存问题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研究和评论，个性得到了相对充分的发挥。应当说，当下的文学研究已经进入比较宽松的环境，对中青年研究者的成长是有益的。我们希望广大有志于赵树理研究的同行们，能够静下心来，不断更新观念，吸取新的研究方法，把赵树理研究推向全新的阶段。

这套《赵树理研究文丛》的出版，得到了山西省委宣传部和晋城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真诚配合，北岳文艺出版社相关领导和责任编辑做了认真的编校工作，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二〇一五年八月

# 目 录

## 绪 论 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反思 /001

- 一、赵树理的“新奇”性 /002
-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外 /004
- 三、“现代”“个体”及其外 /007
- 四、“民间”“地域文化”及其外 /010
- 五、超越“现代性”视野 /015

## 第一章 赵树理评价与当代文学规范的变迁 /017

- 引论：1940—1950年代文学格局中的赵树理 /017
- 一、《小二黑结婚》发表前后 /021
- 二、《讲话》和“赵树理方向” /025
-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赵树理创作的“缺陷” /036
- 结语：规范内外的赵树理文学 /049

## 第二章 赵树理文学的内在历史视野 /052

- 一、“民族形式”的创制：重审“五四新文艺” /055
- 二、“现代”还是“传统”：赵树理文学的性质 /066
- 三、“反现代的现代性” /074

四、赵树理文学现代性的独特内涵 /080

尾声：赵树理文学的命运 /095

### 第三章 再思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097

一、作为问题的“现代性”：从两篇文章说起 /099

二、语言：“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媒介 /102

三、主体：个人主义、“新人”与“还原” /109

四、资源：“新质发于旧胎”与现代性悖论 /114

### 第四章 《三里湾》与赵树理的乡村乌托邦书写 /120

一、赵树理文学的结构与要素 /120

二、《三里湾》：赵树理的“自觉”之作 /127

三、以村庄为主人公的另类现代小说 /140

四、村庄叙事：“共同体”与“社会”的融合 /148

五、“生活的艺术化”与别样地“看风景” /162

六、村庄里的中国：文化、国家与“社会主义”想象 /175

小结 /189

### 结语 赵树理的历史意义 /190

参考文献 /202

后记 /208



## 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反思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暧昧”存在。这种暧昧性，直接地表现为各个时期对赵树理文学评价的不稳定性和评论尺度的内在分歧。这也使得赵树理的文学史形象常常是模糊的与不确定的：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赵树理不过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作家，而另一些评论者则可能认为，正是这种“土”本身却是极为“现代”的产物；一些人认为赵树理不过是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政治文学运作的产物，而另一些人却可能认为正因为对抗这一政治运作才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一种观点认为赵树理只不过是偶然的历史契机造就的宣传家和执着于过时的保守观念的旧式农民作家，而另一种观点可能认为在“宣传性”与“固执”之间，赵树理自有其独特的文学创造……

人们总是能轻易地指认出他的文学“是”什么但同时又意识到他“不是”什么，能够批评他“不是”什么却又意识到他“也是”什么。所有价值判断所无法涵盖的剩余物，并不总是表明赵树理文学是某种“不成熟”的产物，而有另一种可能性存在，那就是借以做出这些判断的理论

框架本身可能存在问题与限度。所谓“削足适履”，也就是赵树理文学具有超出这些理论框架的丰富内涵。赵树理之不断被命名而又反复地不能得到命名，显示的或许正是这种可能性。赵树理文学的暧昧性，不仅表明中国现代文学评价尺度的内在不统一，更显示出了其自身的丰富性与无法被单一现代性想象所涵盖的复杂性。正视赵树理文学评价的暧昧性，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反观并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我们可否想象一种别样的“现代”“文学”？

问题的讨论，可以从赵树理文学的评价史，即各个时期具体的也是历史的批评实践开始。

## 一、赵树理的“新奇”性

1940年代，当赵树理带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出现在中国文坛时，人们用以评价他的最重要语汇大约就是“新奇性”及其出现在文坛的“突然性”。周扬在那篇奠定了赵树理基本文学史地位的重头文章《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中，称赵树理是一个“新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sup>①</sup>。郭沫若则把赵树理和他的作品看作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与那些“庭园花木”相比，“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sup>②</sup>。作为赵树理同代人的孙犁，在1979年写作的回忆文章中，则干脆用“陡然兴起”“时势造英雄”来形容赵树理出现的突然性<sup>③</sup>。

用“新奇”与“突然”这样的语汇来评价赵树理文学，这本身就包含着暧昧的张力。一方面，人们用这样的语汇来表达一种欣喜，好像期待许久的事物“突然”被一个不知名的新作家所实现。周扬在赞扬与提携

<sup>①</sup>周扬：《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sup>②</sup>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文萃》第49期，1946年9月26日。

<sup>③</sup>孙犁：《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

赵树理这样一个“新人”时,称赞他“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他的出现“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孙犁在时隔三十年后则这样写道:“我当即感到,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sup>①</sup>。茅盾的评价略显犹豫,他一边赞美《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创造了一种“新形式”,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但同时,他也有所保留:“虽然我不敢说,这就是民族形式了”<sup>②</sup>。不过,就在茅盾发表这番言论的第二年,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赵树理的创作路径被推崇为样板性的“方向”:这次座谈会的结论以“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为题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sup>③</sup>。

与“不期而遇”构成张力的是“新奇”“陡然”这样的语汇,同时隐含着赵树理文学在中国文坛出现的“突发性”“偶然性”和“不连续性”。也就是说,赵树理文学无疑是“新”的,但他却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必然”的和“内在”的产物,而携带着相当多难以指认或标准之外的“剩余物”。正是这些剩余物的存在,导致对赵树理评价的种种分歧。

多种赵树理传记都会提到赵树理成名之前与抗战期间的太行山区文联主流观念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也导致了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发表过程的曲折和艰难<sup>④</sup>。即便在赵树理作为解放区“明星”作家亮相于第一次文代会的前后,关于《邪不压正》引起的争议仍在继续。如果考虑到在新中国政权建立的当时,“解放区文艺”被认为是“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讲话》的方向,并且“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sup>⑤</sup>,那么,竹可羽等人依据“社会主义现实主

---

①孙犁:《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

②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解放日报》1946年11月2日;《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10期(1946年12月1日写,第二年发表),收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380页。

③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④参见董大中:《赵树理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赵树理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⑤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义的创作原则”，指出赵树理小说没有揭示出“历史的本质”“人物创造，在作者创作思想上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的批评<sup>①</sup>，就显得意味深长。

此后，即便在1950年代赵树理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的时候，人们还是不能忘记同时提醒他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对矛盾冲突的描写不够尖锐、有力，不能充分反映时代的壮阔波澜和充分激动读者的心灵”<sup>②</sup>，对人物的思想描写和社会主义改造斗争的表现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sup>③</sup>。这几乎也成了1949年以后，当代文坛关于赵树理文学评价的一个定论，以致中央领导也需要特别地安排赵树理的读书活动：“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sup>④</sup>。但到了1960年代初期，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赵树理的作品又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为“铁笔”“圣手”。但这种评价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赵树理的改变，而是在“现实主义深化”这一理论命题下人们评价标准的变化。这意味着曾经被视为“缺点”的赵树理文学的某些构成要素，这个时期又被认为是值得重视的批判现实的文学品质。

可以说，不同时期文学规范的转移导致了评论界对赵树理文学的不同评价。而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的评价却是以对赵树理文学的某种一致判断作为前提的。

##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外

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主流话语框架中，在左翼文坛批评话语内部，赵树理评价的暧昧性实则突出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源自苏联而被中国文坛视为创制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高理论原

---

①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再谈谈〈邪不压正〉》，《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

②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文艺报》1956年5—6期。

③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7月。

④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0页。

则——自身包含的两义性与摇摆性。正如佛克马指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即是一种“折中方案”,意思是“既要描写那些可以被看作是现实的东西也要描写那些还不是现实的东西”;侧重其中的“现实主义”成分还是“浪漫主义”成分、作家是作为“观察者”还是作为“教育家或宣传家”,“不同情况有不同的回答”<sup>①</sup>。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浪漫主义”(“社会主义”)这一维度,还是从“现实主义”这一面向,即便是同一对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评判结论。这一创作设想在20世纪30年代即引入中国左翼文坛,在1953年亚洲冷战格局明朗化而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情形下,则被确定为中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sup>②</sup>。竹可羽式的主流批评和60年代初期对赵树理的重新肯定,正是将这一理论原则引入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两种不同后果。

在80年代以来的许多研究中,竹可羽式的批评(其极端形态表现为1959年武养对《“锻炼锻炼”》的激烈否定),常常被视为“极左”文艺路线对赵树理创作的恶意歪曲和武断指责。但是,如果我们并不采取一种辩护式的研究姿态,即在批判“极左”路线这个前提下把研究作为回护赵树理文学价值的方式,而是进一步观察两种分歧的内在理路的话,可以发现,40年代关于赵树理的“发现”和“命名”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这种激进批评的可能性。

40年代批评界对赵树理文学的命名始终包含着两个面向,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的说法,一是“政治性”强,表现在反映“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基本矛盾”(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面向),一是创造了“民族新形式”,表现在“选择群众的活的语言”“着重写故事”“不做与现实斗争无关的叙述和描写”(这被理解为其“现实主义”的面向)。但是,这两个面向在不同的评论者那里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强调赵树理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突出的是前一面向;强调赵树理小说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文学形式,突出的则是后一面向。更复杂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

---

①【荷兰】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3—109页。

②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原则的两面性,其实呼应的正是“当代文学”得以诞生的基本历史语境内在的矛盾性。可以认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和1939年至1941年由左翼文坛扩展至国统区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构成了塑造“当代文学”的两个主要话语事件。而值得深入分析的是,在《讲话》所侧重的“工农兵文艺”这一阶级维度与“民族形式”所侧重的文艺大众化这一民族维度之间始终存在着并不明朗的紧张关系。如果“以先验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来改写现实,使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浪漫主义’,可以说是毛泽东文学观中的主导的方面;5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口号的提出,是合乎逻辑的展开和延伸”<sup>①</sup>,那么,竹可羽、武养式的激进批评(或批判)正是在这一脉络上的深入,他们特别强调的是一种政治观念与理想的“历史本质性”。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则突出的是塑造一种包含普遍性的“国民文艺”构想的诉求。“工农兵”与“国民”之间的裂隙并不能很快弥合。关键就在于那些赵树理所最擅长书写的“落后的”“旧式”农民,到底应该在作为政治概念的“农民”/“阶级”意义上批评其不够先进,还是在作为历史概念的“中国”/“农民”的意义上赞扬其在文学中得以出场?这一分歧,不仅是“浪漫主义”(或“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延安文艺传统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在分歧,它同时还表明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将自身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纳入“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现代世界的文学时所必须完成的“质”的跳跃。

就赵树理文学的评价而言,如果这两种不同的评价尺度都能在赵树理文学中找到它们需要的东西,又同时感到不满足,那么就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可能性,即赵树理文学可能是一种既不能由“浪漫主义”也不能由“现实主义”加以描绘的文学形态,它可能根本就处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得以出现并寄身其中的现代文学体制的“外面”。

无论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断裂和转型,它们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文学体制的创制却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

<sup>①</sup>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